

文白对照全译

資治通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342413

资治通鉴

——文白对照全译本

重庆师范大学
学前教育学院
图书

K204.3

0142

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CS151888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 / (宋) 司马光著; 冯国超等译.
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5402-1414-7

I. 文… II. ①司… ②冯… III. 资治通鉴 - 译文
IV. K204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3018 号

责任编辑 里 功
封面设计 唐永跃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市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mm 32 开 303.75 印张 9000 千字

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 定价: 1680.00 元

文白对照《资治通鉴》编译者名单

冯国超	许海星	王进军	王学明	王向彪
李丹丹	李振华	李学军	李 芳	刘洪军
刘国新	杨 军	赵小明	郭志军	姚金平
徐怀才	张文良	张彬彬	谢志厚	林存阳
王小其	鉴传今	向 斌	许文继	苏 君
周志红	马新华			

文白对照《资治通鉴》前言

《资治通鉴》为北宋司马光所编纂的编年体通史。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 403 年),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 959 年),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,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,三百余万字。《资治通鉴》史实考信,史论精当,考评历史兴衰,镜鉴后世治道,既为研史者、学史者、爱史者必读之书,也是历代政治家案头必备的治业经典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,成为他们常看不厌,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。元世祖忽必烈这位马上皇帝非常重视《资治通鉴》,专门请儒士为他讲解《资治通鉴》之中的治国之道,并设立了蒙古国子学,用蒙古语言译写了《通鉴节要》作为教材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极为推崇《资治通鉴》,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《资治通鉴》,认为“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,身体力行《通鉴》原则”,以此常常训戒左右大臣。清圣祖康熙对《资治通鉴》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,经常翻阅,认为通鉴“事关前代得失,甚有裨于治道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中有关晋身处世之道也历来为古代名臣所乐道,曾国藩对《通鉴》叹为观止,终生受用,曾言及此:“窃以先哲经世之书,莫善于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,其论古皆折衷至当,开拓心胸。若能读此书,将来出而任事,必有持循而不至失坠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在现代仍然有着极大的史学价值,一代伟人毛泽东对《资治通鉴》爱不释手,他对通鉴的评价可作为我们现在人阅读时的一个指导:“《资治通鉴》这部书写得好,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,但叙事有法,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,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,借以熟悉历史事件,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”

读《资治通鉴》对现在读者来说,古文是一大障碍,严重影响对通

鉴的普及工作。基于此,我们邀请精通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汉语的专家、学者数十人,对其进行逐字、逐句的翻译和考订,文白对照,有助于读者对照原文,读懂读通这一史学巨著。如此,可谓为传播我华夏文明,尽一份赤子之心。

编者

二〇〇〇年九月

《资治通鉴》:中国古代政治百科全书

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古代一部实用政治百科全书。宋英宗治平三年(公元1066年)四月,司马光受命于英宗皇帝,遍阅历代旧史,旁采诸家传记,删繁去冗,举要提纲,前后用了十九年时间,写完全书。因其“专取关国家盛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”的历史素材,故神宗皇帝“以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

传统中国人心目的“好皇帝”,基本上都善于以史为鉴,勤于读书,从历史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素材,树立自己的帝王的形象。自从《资治通鉴》问世以来,历代帝王都如获珍宝,作为必读之书,以资治道。

正因为《资治通鉴》对专制统治有如此巨大的妙用,历代帝王都视如珍宝,身体力行。元代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,非常重视《资治通鉴》,他不仅亲自请儒士们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,而且还在至元八年(公元1271年)正月,设立蒙古国子学,用汉族文化教育勋戚子弟,把用蒙古语言译写的《资治通鉴》作为教材,以适应汉族的政治传统。

明代帝王极为推崇《资治通鉴》。从朱元璋始,无不致力于“习闻明知古代帝王治道”,“身体力行《通鉴》原则”。他们几乎每天清晨都要研读这部史书,企图从中获得运用权力的技巧,锻炼识别忠奸贤愚和是非黑白的能力。

清代,康熙皇帝更是对《资治通鉴》推崇备至。他说,《通鉴》“事关前代得失,甚有裨于治道”。据此,他还进一步提出了“共四海之利

为利，一天下之心为心。体群臣，子庶民。保邦于未安，治乱于未乱。夙夜孜孜，寢寢不遑。宽严相济，经权互用，以图国家久远之计”的政治纲领。

由此可见，《资治通鉴》在中国帝王专制社会中影响深远，甚至可以和儒家的经典相提并论，一个务虚，一个实用。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来说，后者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《资治通鉴》无疑成为封建帝王的必读书。

当然，这样一部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”的政治史籍，也不是每个帝王都通览无余。但是，其中所包容的封建政治传统和专制主义思想体系，却一直是帝王们长期袭用的精神武器。因为，在中国古代，“治乱之道，古今一贯”。诸如：重治人，轻治法；屈民伸群，隆君抑臣；文治武功，经权互用；为政以德，教化为本；执简驭繁，循名责实；信赏必罚，刚健强矫；德威并用，剿抚兼施；一张一弛，宽猛相济；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；强干弱枝，分化事权；以仁为本，以视为用；克守名分，统一纲纪；惟忠惟顺，重德轻才。等等。

历代帝王们正是运用诸如此类的“治道”，继大统，承宗庙，以防止“王纲不振，君权恶落，内忧外患，名分紊乱”。《资治通鉴》的精神薪火传沿。

历史常常就是一面镜子，透过这面镜子，我们可以看到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特征。《资治通鉴》一直是帝王的镜子，研读它也仅仅是帝王将相们的特权。如今，君主专制制度早已被人民共和制度所取代，亿万公民都成了“皇帝”，这面帝王的镜子，日趋成为公民了解本国政治传统的工具和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，亦即成为人民的镜子。900多年前，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旨在给帝王们上经验总结课，其实，在今天他是在给人民上大课。人民可以透过这面镜子看到本民族历史上的“精华”和“糟粕”，为承前启后，推动本民族的发展做好文化上的准备。

从古代典籍提供的历史资料来看，中国古代政治的发生、发展，始终与宗法血缘关系错综交织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也始终没有摆脱宗法观念的束缚。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第一大特性。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政治从社会中产生，凌驾于社会之上，形成上层建筑。在

中国古代,政治与社会相分离的过程十分不明显,实际上政治并没有完成与社会相分离的过程,而是一直保持着政治与社会的一体化状态。

中国古代政治产生的这一特点,使得后来出现的“国”成为“家”的放大体,政治渊源于宗法血缘关系之中,政治体制也以家长制为核心。孔子在答复一个声称不肯从政的人说:“惟孝、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,奚其为政?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意思是说,在家里孝顺父母,友爱兄弟,就有政治功效,就等于从政,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呢?所以,在我国封建社会,“移孝作忠”,“移亲事君”,皇权依靠“孝、亲”等伦理规范来维系。一个人与掌权者血缘关系远近和接近的程度,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政治地位。上自皇室,下至朝臣,无不重用子弟亲戚,布满要津。汉高祖刘邦所谓“非刘姓不王”达到这一思想的极致。即便是平民百姓,也深深懂得“攀龙附凤”的价值。这样,中国古代的政治史,主要成了以掌权家族为轴心的权力斗争史。

另外,中国古代,“人治”政治较为发达,“法治”居于从属地位,甚至为“人治”扭曲变形。中国“重人治,轻法治”的历史延续二千多年,将这一传统系统化、理论化的是儒家学派。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上就说:“为政在人,人存政举,人亡政息。”具体到君王头上,那就是孔子所倡导的“一言兴邦”,“一言丧邦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。因而,“法不能独立”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荀子说:“法者治之端也,君子者法之源也。故有君子,则法虽省,足以偏矣;无君子则法虽具,失先后之施,不能应事之变,足以乱矣。”(《荀子·君道》)。可见,对于“法治”的不足之处,儒家是非常强调的。而法家反对儒家的“人治”说,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讥讽儒家“释法术而心治,尧不能正一国”(《韩非子·用人》)。强调“以法治国”,“不殊贵贱”。但由于法家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言“法”,所以,他们的“法治”仍主要是以“尊王卑臣”、“正君臣上下之分”为前提。而且,在法家看来,“夫生法者,君也;守法者,臣也”(《管子·任法》)。在实践中,君主“一言可以立法”,“一言可以废法”,法律不过是君主控制臣民的工具而已。可见,我国古代并没有成熟近现代意义上的“法治观念”。

中国古代的“人治”政治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(1)“用人”;(2)

“治事”。体现在“用人”方面,就是以掌权者的好恶和利益需要来选择人才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,就曾记载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故事,来说明这一点:

上(汉武帝)尝幸至郎署,见一老翁,须鬓皓白,衣服不整。上问曰:“公何时为郎?何其老也?”对曰:“臣姓颜名驷,江都人也,以文帝时为郎。”上曰:“何其老而不遇也?”驷曰:“文帝好文而臣好武,景帝好老而臣尚少,陛下好少而臣已老:是以三世不遇。”上感其言,擢拜会稽都尉。

这种任用方式显然没有什么法律程序可言。历朝帝王前几代尚可以实行一下“任人唯贤”的用人方式,但凭一人之识断,真正能识得几个贤才则不得而知,出于个人的偏爱,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两个最受宠幸的亲近臣子,如汉朝前期,刘邦的籍孺,吕后的审食其,文帝的邓通等等,这些人不学无术,在内专以阿谀逢迎取媚皇帝,在外往往擅权用事,胡作非为。

类似的“用人”故事,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屡见不鲜。只要皇帝高兴,无论何时何地,不是赏赐,就是封官、许愿。汉武帝元光五年,齐国人轅固,九十多岁,也被遴选为贤良,征召到长安做大臣。唐德宗时,皇帝因外出打猎,偶然遇到农民赵光奇,因其直说百姓不高兴的事,便下令免除他全家的赋税和劳役。唐宪宗时,泾阳县令李行言,因“性格固执”,被擢升为海州刺史。当然,这些例子都是作为古代帝王的“贤明”而载之于史书,至于那不关心民瘼,任意任用佞臣的现象在历史上更是举不胜举。

体现在“治事”方面,就是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人,一切政令自天子出。少数开明的皇帝尚能善于“纳谏”,以补救个人决策的差错,多数皇帝则武断专横,刚愎自用。从古代行政管理来看,独揽权力,无所不包的管理成为其共同特点。

与这种浓厚的“人治”传统相关,中国古代政治中,“术”的作用非常突出。在整个传统政治文化中,有关这方面的术语和范畴占有很大的比重。“权术”本来是政治生活中带有必然性的东西,复杂多变

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必然带来人们政治行为的复杂化和权变特点。关于这一点,可以说古今中外盖莫能外,但唯独我国最盛。先秦法家是权术的积极倡导者,韩非无疑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认为,古代帝王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,必须掌握驾驭群臣之术。他说:“术者,藏之于胸中,以偶众端,而潜御群臣者也。”(《韩非子·难三》)而且,在法家看来,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位一体,均为帝王手中的工具。尽管法家的这种思想并没有被尊奉为“正统”,但帝王们在实践中的运用,实际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正如儒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“贡献”是“礼”一样,法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“贡献”主要表现在“术”上。

中国古代,“术”的发达,一方面与“家天下”的政治格局有关。一家一姓的统治,必然带来各种复杂的政治矛盾,不同家族成员因利益分配不均,彼此争权夺利,君臣之间相互猜疑和防范斗争不可避免。要解决这些复杂的政治矛盾,就不能不去使用各种策略手段。另一方面,也与中国古代频繁的军事战争有关。兵不厌诈,为达其目的,不择手段,这是兵家常训。由于古代周期性的改朝换代,常常伴随着军事战争,古代帝王们大都曾亲临战场,使用过兵家权谋。所以,他们在守成时期也常常将兵家权谋带到政治舞台上。从姜太公的“六韬”,战国七雄的“阳术”、“阴谋”,老子的“弱用之术”,申韩的“刑名之术”到唐代大宦官仇士良的“盗用皇权之术”,阴阳热冷,各种眉目,不一而足。如有细心者,可把古代帝王的各种“术”蒐集起来,加以研究,一定会对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所收获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中国古代的权术足以使马基雅维里《君主论》中的权术叹服。

由此可见,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政治百科全书。综观全书,上迄“三家分晋”,下止“周世宗征淮南”,历经十六个王朝,共二百九十四卷,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古代政治史迹编纂起来;既有就史论史者,又有籍史论事者,史论结合,颇为实际。书中,有关“明君、良臣,切摩治道,议论之精语,德刑之善制,天人相与之际,休咎庶证之原,威福盛衰之本,规模利害之效,良将之方略,循吏之条教,断之以邪正,要之于治忽,辞令渊厚之体,箴谏深切之义”(《资治通鉴·序》)。对典章制度沿革损益,也给以详尽叙述。因此,研究中国传统

政治文化,《资治通鉴》应为首选书。

一

《资治通鉴》作为专门为帝王镜鉴的政治教科书,对帝王们夺取权力、驾驭权力、运用权力等帝王术多有记载。

中国古代的帝王,大都依靠武力争夺,取得政权,他们根本不需要与谁订立契约,更不会受到弹劾,因为天下是他家的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生杀予夺,毫无限。只要最终夺得天下,那就理所当然地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,符合上天的旨意,臣民百姓应当绝对服从。刘邦进关时,曾与诸县父老、豪杰“约法三章”。但这主要是为了取信于民,消除人们对他的恐惧,收取人民对他的支持,以便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,控制关中,夺取政权。

我们知道,在中国历史上,有可能争夺帝位者不外三种人:一是豪族地主,如刘秀、曹操、孙权、李世民等;二是流氓,如刘邦、刘渊、石勒、朱元璋等;三是农民起义领袖,如陈涉、黄巢、李自成、洪秀全等。这些人在打天下时,都有礼贤下士和豁达豪爽的性格特点。一旦他们夺得政权,那就是绝对不可侵犯的,任何力量,也不得越雷池一步。

豪族地主多出身于官僚世家,他们“连栋数百,膏田满野,奴婢千群,徒附万计”。一旦天下有变,常筑坞堡以自卫,或则率其部曲,招兵买马,收罗人心,作争夺帝王的准备工作。这部分人,自信、高贵,有所凭借,便于取得权力。流氓和农民起义领袖,则仗义疏财,来去自如,勇于冒险。但由于他们没有争夺帝位所凭借的物质力量,又缺乏足够的知识,所以不如豪族地主做皇帝来得容易。

但不论谁做了皇帝,他们的个性心理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概括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点:

第一,豪气干云。中国帝王,大都历经杀场,一生悲壮。统一国土,守住江山,是他们终生奋斗的极点。在他们看来,统一大业,就是“帝业”。为此,“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,亦当遗臭万年”。他们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具有气吞山河的气魄。秦始皇“起诸侯,并天下,意得

欲纵,以为自古莫及”。他生前巡行天下,到处树碑立传,诸如:

皇帝作始,端平法度,万物之纪;皇帝之德,存定四极;六合之内,皇帝之士;人迹所至,无不臣者,体道行德,尊号大成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

死后还要在坟墓中,用水银灌注成大江大海,以示威灵,震慑群鬼。唐代大诗人李白赞美他:“雄图发英断,大略驾群才”。霸王项羽自称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。刘邦自诩:“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”。此后,帝王无不以“应天御世,居中土而制四海,自是比隆尧、舜”。帝王们面对着普天之下的歌功颂德,联想到四海之内,江山秀美,皆“余一人”所有,常发出“舍我其谁”的慨叹。唐太宗常对左右侍臣说:“帝王视四海如一家,封疆之内,皆为朕赤子”。

第二,独擅其权。《资治通鉴》上说:“生杀之柄,人主之所得专也”。帝王绝不允许有什么力量与之抗衡。他“功德如天地,万物不得而名言”。在他看来,天下是他于马上得之,他理应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,甚至同姓子弟,也不得与之平起平坐。所以,唐太宗说:“自古以来,帝王大多不喜欢胜过自己的人”。对于那些“戴震主之威,挟不赏之功”的功臣宿将,历代帝王都想方设法,来削弱和分割他们的权力,甚至采取大规模杀戮功臣的极端做法,比如,秦末动乱中,辅助刘邦,击败项羽,创建汉朝,功臣武将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然而,这些功臣武将在统一天下后,大多命丧黄泉。汉王朝刚建立,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武将便以企图谋反的罪名而遭诛杀。韩信临死时,还留下了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;敌国破,谋臣亡。天下已定,我固当烹”的千古名句。被刘邦誉为“镇国家,抚百姓,给饷馈,不绝粮道”的萧何,虽然在统一天下后担任宰相,但是也曾一度被贬下狱。而“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张良,则在天下已定时,避开权力,隐居山野,才能够独善其身,安享晚年。同时,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周勃,在诛杀吕姓家族后,有人进言:

君既诛诸吕,立代王,威震天下。而君爱厚赏,处尊位,

久之，即祸及身矣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三）。

于是，周勃自危，谢病离职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唯独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，得天下后没有杀功臣，但为了确保皇权独尊，他们采取了另一种“和平”的方式罢释兵权，还是对功臣不放心，赏以丰田美宅，消耗其斗志。所以自古以来，都有“功臣不可为”的慨叹。

清朝，有个叫汪景祺的人，曾写了一篇名为《功臣不可为》的文章，开头就说：

鸟尽弓藏，古今同慨。诸者或谓：功高不赏，挟震主之威，不能善自弭晦，故鲜有以功名终者。

这篇文章，曾刺痛了当时的雍正皇帝。

第三，事必躬亲。中国的帝王，也是世界上君主行列中少有最忙碌的，他集一切大权于一身，怕大权旁落，他必须象管理家务一样治理国家，各类奏章，皆上彻御览，各种事物，必亲自过问。秦朝初年，卢生和侯生曾讥讽秦始皇：

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，上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，贪于权势至如此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。

据史记载，秦始皇“昼断狱，夜理书”，每天要看上一百二十多斤的呈文。汉高祖刘邦出身微贱，不拘小节，但在治理国家上却丝毫不肯放松，常问及臣下类似“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”“一岁谷入几何？”等问题。朱元璋对“对外奏章皆上彻御览，每断大事，决大疑，臣下唯面奏取旨”。康熙皇帝要求地方政事“虽微如芥子，细如茧丝”，也必须上报。在他用兵期间，一天就批阅奏章四百本。

第四，恐忌猜疑。中国古代，常有“王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”，“兵常无帅”以及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、“强者必先反其君”的说法。诸如此类，都是帝王猜忌多疑的体现。在专制体制下，“君对臣以礼，臣侍君以忠”只不过是君臣关系的一种最佳设想。其实，大多

数帝王，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，常常善于猜忌，喜怒无常，疑心重重。那种正常的君臣关系，往往变成“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最差状况。君王对待大臣，欣赏时，言听计从，相见恨晚，一旦生忌，必当铲除，全族屠灭。比如，秦始皇对李斯，刘启对晁错，刘彻对主父偃。帝王这种丧失宝座的恐惧心理，经常会造成大批诛杀权臣和频繁更换太子的现象。刘邦晚年把所猜忌的功臣消除干净后，便想更换太子，后被张良、叔孙通等人说服，只好作罢。刘彻晚年，甚至因多疑而杀掉心爱的钩弋夫人，立她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。

顷之，帝闲居，问左右曰：“外人言云何？”左右对曰：“人言‘且立其子，何去其母乎’？”帝曰：“然，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，往古国家所以乱，由主少、母壮也。女主独居骄蹇，淫乱自恣，莫能禁也。汝不闻吕后邪！故不得不先去之也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三）。

可见，中国帝王为使江山长久地守下去是没有任何人间感情的。

第五，高深莫测。中国帝王常常是：“在深宫之中，而明察四海之内”。越是专制的帝王，越是更加“深居”、“寡言”、“备内”。“皇天以无言为贵，圣人以不言为德”，对待臣下，他们常把自己打扮得高深莫测，朦朦胧胧，使自己可望而不可及，给臣下以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；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的神秘感，对他不可捉摸。对国家的大政方针，他们喜欢“兼听而独断”，在暗中观察一切，操纵一切，然后指挥一切。对重大的人事任免，他们往往突然做出决断，防止臣下摸到自己的意向而沾沾自喜或提前背叛自己。正象韩非说的那样：“是以明主用术，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。

中国的帝王，应该说是最不自由的，由于上述所述的个性心理，他们一到晚年，便心情忧郁、苦闷、孤独，怀旧情绪油然而生。比如，刘邦一生远离家乡，征战南北，伴有群雄，从不眷恋自己的家乡。到了晚年，功臣纷纷斩杀，他内心的孤独寂寞之感愈加强烈。他那悲壮凄凉的《大风歌》，就是这个时候唱出的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
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
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

帝王晚年，忆往昔战场上的峥嵘岁月，联想到开国初期的雄心勃勃以及现在的年迈体衰，愈加多疑、孤寂，喜怒无常。刘邦临死前，就曾诛杀了有恩于己的丁公，释放教唆韩信谋反的蒯通。征讨英布时，他为流矢击中，吕后请来良医，可他漫骂道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！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！”于是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治疗。

帝王晚年，威愈高，权愈重；权愈重，他们愈加担心死后将会发生的一切。所以，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把未来的一切安排向他所希望的目标靠近。刘邦生前，就曾把后两代宰相职位安排好了：

吕后问曰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既死，谁令代之？”上曰：“曹参可”。问其次，曰：“陵可；然少戆，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知有余，然难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二）。

帝王的这个心理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它严重地阻止了中国人对其他政权传递规则的探讨。

《资治通鉴》这部煌煌巨著，可以说处处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政治的特殊理解。它自始至终贯穿了这样一个主题：如何夺取权力，如何运用权力，如何保护权力。皇帝专权，皇亲国戚争权，宦官趁势夺权，历史上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，都基本上通过权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漫长的历史发展，似乎都没有离开过权力斗争。所以，长期以来，在中国人的头脑中，“权力的夺取和运用”，就是政治，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特殊的、也是唯一的含义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权者，君之所独制也。”“夫爵禄废置，杀生予夺，人君所以驭臣下之大柄也。”君王的权力不可转让，不可分割，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占首位的政治价值观念。在礼、法、令、权等政

治诸要素中，“权力”当之无愧地居于首位。慎子曾以一个比喻，来形容权力的重要性。他说：权力，就象飞龙离开云雾，从天上掉下来与蚯蚓同辈一样，君王一旦失去它，就要与匹夫为伍，甚至连匹夫都不如。

所以，历代封建君王最关心的也是：大权不能旁落。绝对不能与臣下“共权”，更不可借人；否则，“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”即使不能事必躬亲，但也必须设法强化“治权”，分化“事权”。韩非子认为，“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，是这一君权思想的代表。

这样，“唯器与名，不可借人”这一为《资治通鉴》引用十数次之多的话，就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句政治格言。

在专制制度下，君主一旦掌握权力，就必然设法使之绝对化、固定化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监察、军事等各种权力于一身，“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”。倡导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。……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”。汉武帝掌握政权以后，进一步加强皇权，由亲近的侍从组成“中朝”或“内朝”，用以控制并取代以丞相为首的“外朝”，以保证其绝对地占有权力。并且，依靠儒家学说，将皇帝的专制权力合法化、固定化。光武帝刘秀夺取政权以后，“三公”的权力形同虚设，“政不任下，虽置三公，事归台阁，自此以后，三公之职，备员而已”。一切行政大权统归于皇帝一人，国家各权力机关，不过是皇帝的摆设而已，随时可以升、降、取代。武则天获得权力以后，同样，“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，政由己出”。

总之，独占权力，这是古代封建社会帝王专制政治的共同特征。

中国古代社会另一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观念，就是把最高统治者——君主，抬高到无以复加的至上地位。君主凌驾于社会之上，享有最大的权力，拥有普天下的土地，肩负最大的责任。世代君主，以其无上的威权，统御国家和万民，在政治结构中，居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上说：“为政之要，在于用人。”

治国之道的核心，是“君道”，而“君道”的主要内容，就是“用人”。

在中国古代帝王中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，最早说明了这一观点，他也是古代最善于“用人”的帝王之一。